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马唐草边疆

〔美〕肯尼思·杰克逊 著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马唐草边疆

〔美〕肯尼思·杰克逊 著

王旭 李文硕 王宇翔
刘敏 孙群郎 译



商务印书馆

2018年·北京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唐草边疆/(美)肯尼思·杰克逊著;王旭等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8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ISBN 978-7-100-16061-2

I. ①马… II. ①肯… ②王… III. ①城市史—美国
IV. ①K712.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8)第 081245 号

权利保留,侵权必究。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马唐草边疆

〔美〕肯尼思·杰克逊 著

王旭 李文硕 王宇翔 刘敏 孙群郎 译

商务印书馆出版

(北京王府井大街 36 号 邮政编码 100710)

商务印书馆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ISBN 978-7-100-16061-2

2018 年 6 月第 1 版

开本 850×1168 1/32

2018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张 20 1/8

定价:62.00 元

Kenneth T. Jackson

CRABGRASS FRONTIER

The Suburbaniza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Copyright © 1985 b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经版权方授权，根据牛津大学出版社 1985 年平装本译出

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

出版说明

我馆历来重视移译世界各国学术名著。从 20 世纪 50 年代起,更致力于翻译出版马克思主义诞生以前的古典学术著作,同时适当介绍当代具有定评的各派代表作品。我们确信只有用人类创造的全部知识财富来丰富自己的头脑,才能够建成现代化的社会主义社会。这些书籍所蕴藏的思想财富和学术价值,为学人所熟悉,毋需赘述。这些译本过去以单行本印行,难见系统,汇编为丛书,才能相得益彰,蔚为大观,既便于研读查考,又利于文化积累。为此,我们从 1981 年着手分辑刊行,至 2016 年年底已先后分十五辑印行名著 650 种。现继续编印第十六辑、十七辑,到 2018 年年底出版至 750 种。今后在积累单本著作的基础上仍将陆续以名著版印行。希望海内外读书界、著译界给我们批评、建议,帮助我们这套丛书出得更好。

商务印书馆编辑部

2018 年 4 月

献给芭芭拉和我永远想念的
次子肯尼思·戈登·杰克逊(1968—1984)

鸣 谢

7

在从事这个课题研究的漫长的过程中,我受益于多方的帮助,对于他们,无论怎样感谢都不为过。全国人文学科基金会、约翰·塞蒙·古根海姆纪念基金会、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为我提供了研究基金和研究时间;1982年设在乔治·华盛顿大学的班耐克教授职位,又使我能够充分利用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和国家档案馆的很多资料。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历史系的杜宁研究基金为我的书稿资料的打印提供了帮助。我在全国查询资料和实地调研的工作是惬意而富有成效的,多亏下列人员的协助:休斯敦的 Joyce Dalbey;新奥尔良的 Dale & Douglas Curry 夫妇;南卡罗来纳州哥伦比亚市的 Sarah and Austin Tothacer 夫妇;亚特兰大的 Patey & Lewis Lanter 夫妇;北卡罗来纳州查珀尔希尔市的 Phyllis & Roger Lotchin 夫妇;芝加哥的 Darry & Michael Ebner 夫妇和 Carolyn & Jan Benjamin 夫妇;杰克逊维尔的 Juanita & Hiram Caroom 夫妇;费城的 Mark Haller;达拉斯的 Estelle & Bob Crenshaw 夫妇;戴顿的 Wanda and Alan Goldstein 夫妇;华盛顿的 Anne & Thomas Scheckells 夫妇;Thomas M. McNair, Patrick W. Murphy;丹佛的 Harry L. Davis;韦斯特切斯特的 Paula & Max Schouten 夫妇, Sally & John Cunningham 夫妇,

Mary & John Heilner 夫妇;圣何塞的 Betty and Robert Hume 夫妇;旧金山的 Gaithe and Byron Smith 夫妇;洛杉矶的 Kenneth M. Batinovich, Sue & Clelland Downs 夫妇;圣迭戈的 Sally & Pete Finch 夫妇。Christine & Val Sharp 夫妇在莱克福里斯特、格林威茨以及拉迪的家里欢迎我,每次都打开家门和冰箱门,任我
8 随意享用,与我成为至交。在孟菲斯,Carolyn & John Parish 夫妇总是把我视为他们的孩子;而我的母亲 Elizabeth William Jackson 在这些年里非常支持我、关爱我,周到地照顾我,我的很多朋友也都说她待他们亲如子女。

任何熟悉这个题目的人都看得出,我大量援引了其他学者的相关著述。在这里我尽可能地一一列明。我感谢下列人员提供了难以计数的批评和建议,他们是:Alan F. J. Artibise, John F. Bauman, Stanley Buder, Clara Cardia, Michael Conzen, Leonard Dinnerstein, Michael Ebner, Roderick French, David R. Goldfield, Susan S. Hallas, David Halle, Glen E. Holt, Timothy Jackson, Roger Lotchin, Michael McCathy, Zane L. Miller, Jon A. Peterson, Stanley K. Schultz, Allen Share, Bayrd Still, Joel A. Tarr, Sam Bass Warner, Jr., Margaret Kurth Weinberg, Olivier Zunz。Deborah S. Gardner, Camilo J. Vergara, Carol Willis 与我分享他们收集的照片,而 George Tremberger 在百忙中抽出时间为本书绘制图表。在美国遗产公司,Patrick Bunyan 从卷帙浩繁的档案中找到合适的图片,艾弗里建筑图书馆的 Janet Parks 和 Jay Hendrickx 也是如此。在美国住房与城市发展部, Frederick J. Eggers, Mary A. Grey, William A. Rolfe, Joan Gil-

bert(现在耶鲁大学任职)帮助我破解官僚部门的谜团,而 Joseph B. Howerton, Jerry N. Hess, Charles Gellert 指点我在国家档案馆如何找到有价值的资料。Ben H. Graham, Wallace E. Johnson, Martin Winter 慷慨地放弃了手中的基建生意,帮我追溯住房建筑产业的历史。

在我任教 17 年的哥伦比亚大学, Stuart Bruchey, Ainslie Herbert J. Gans, John A. Garraty, Henry F. Graff, Herbert S. Klein, Peter Marcuse, Robert A. McCaughey, Eric L. McKittrick, Robert O. Paxton, Rosalind Rosenberg, Elliott Sclar, James P. Shenton, Alden T. Vaughan, Gwendolyn Wright 都是慷慨无私而乐于助人的学者。William E. Leuchtenburg 是我在莫宁塞德-海茨认识的第一个学者,他后来离开了纽约,但此前他在专业上和个人生活上一直鼓励和帮助我,他严谨而扎实的治学风格一直是我效仿的榜样。我教过的很多学生,特别是 James Baughman, David Bensman, Euenie Ladner Birch, William N. Black, Kenneth Cobb, Estelle Freeman, Deborah Gardner, Mark Gelfand, Timothy Gilfoyle, Jacquelyn Dowd Hall, David Hammack, Clifton Hood, Betsy W. Kearns, Thomas Kessner, Veronique Marteau, Eleanora Schoenebaum, David Schuyler, Frank Vos, Ray Weisman, Carol Willis, 他们从本书中可能会找到自己曾提出的某些见解。我的老师 Richard C. Wade 先生 20 年前在芝加哥大学任教时曾借用“马唐草边疆”这个表述,他是我在城市史方面的启蒙导师。我想他会知道他的思想和榜样自那时起对我产生了何等重要的影响。

9 牛津大学出版社的 Sheldon Meyer 是非常耐心而真诚的朋友,也是一个有价值的顾问;同一家出版社的 Pamela Nicely 则帮我修正了书中的数十处纰漏。错缪之处仍在所难免,作为作者,当然是文责自负。

本书的某些部分已以某种形式发表,因此,这里我要特别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行为研究院高级研究中心、《城市史杂志》、《芝加哥历史》杂志、哥伦比亚历史协会、塞奇出版社公司、沃兹沃思出版公司,以及达布戴出版公司慷慨应允本书收录先前发表的某些论文。

撰写本书过程中最重要的人当然是我的妻子 Barbara,包括这部著作以及我的两个孩子在内的我生命中美好的事物,都源自她的奉献、牺牲和激励。她使我看到了某些我可能永远也注意不到的事情,她帮助我渡过一个又一个难关,陪伴我分享了 23 年的风风雨雨,我希望借此表达我对她的感激和爱慕。

就在本书付梓前两周,我们 16 岁的爱子在一场车祸中丧生,出事地点距我们家仅几英里。Barbara 和我都经历过失去父母和朋友的痛苦,但我们从没想到会在家门口面对警察和牧师,不然,这本该是一个平静的周五的晚上。Kenneth Gordon Jackson II 与他的兄弟们、朋友们终日厮守,他爱着他的鼓、他的运动,以至于无暇顾及他父亲的书,但他教会我如何使用电脑,这份书稿就是用电脑打印出来的,他帮我安装了第一个文字处理系统,把我的软盘格式化并整理其内容。无论何时,只要我一有问题,他就立即出现在我面前。更重要的是,他促使我离开办公桌,无数次地和他进行乒乓球比赛,去滑雪,观看比赛,滑铁圈,打垒球,扔飞盘。虽然在这

个世界上每一个人都是独特的，但正像他的朋友 Edd Payne 形容的那样，Gordon 比任何人都不寻常。他在太多太多方面都极有悟性——他的微笑、他的机敏，他喜爱户外运动，他对每一种动物都有怜悯之心，他笑对新的事物和挑战，他有很多朋友，但没有传统的门户之见。我的余生将永远记着我的儿子，他永远活在我的心中。

Gordon 突然离去之后，很多朋友来安慰 Barbara、Kevan 和我，他们帮着清理房间、做饭，以减缓我们的痛楚，分担我们的忧愁。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读过这份书稿，对本书也一无所知；但他们所做的事与我们息息相关，想方设法缓释我们内心的空虚和伤感。我们要感谢所有这些人，特别是 Jack Silvey Miller 牧师，他帮助我们重新站起来，在我们最需要的时候给我们以爱。

肯尼思·杰克逊

1984 年 11 月 12 日

于哥伦比亚大学

导 言

3

就在你读到此刻,以平方英里计数的、模式单一的“火柴盒”正在像坏疽一样四处蔓延……可以想见,由贪婪驱动的开发,所到之处无不滋生腐朽。

——约翰·基茨(John Keats):《落地窗上的裂痕》

(*The Crack in the Picture Window*)

纵观历史,一个民族对特定住所的处理和安排,与其他富有创意的艺术品相比,彰显了更多的意义。住房是人们内心的外在表现形式;任何一个社会,如果不考虑其成员的住所,就无法充分地理解他们。有一首 19 世纪的歌曲这样表白:“哪里都不能与家相比。”尽管置身翡翠城(法兰克·包姆虚构的首都之城)中,多萝西却实在想不出哪里有比她在堪萨斯的家更好的地方。我们的家是我们远离尘嚣的港湾。

本书所研究的,正是美国人居住的这种港湾。书中阐明:我们周围的空间——邻里、道路、院落、房屋以及公寓的实际组织形式——决定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正如刘易斯·芒福德(Lewis Mumford)曾经说过的:“房屋的建造是任何一种文明的重要成果。”显然,这些特定形式的人工环境是多种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包括技术、文化类型、人口压力、土地价值以及社会关系；即便是在非常死板苛刻的条件和技术限制下，各种物质模式的产生也都是可能的。工作、宗教以及家庭生活可以在单一空间内完成，也可以在分离而专业的空间中进行。无论这种模式强调紧凑性（如维也纳），还是侧重分散化（如当代美国），都是选择的问题。拿西非马里中部山区的 25 万名多贡人来说，他们长期深居马里内陆，好几个世纪的时间都难得有任何改变。多贡人居住在崎岖、贫瘠的山地，他们把村庄建在陡峭的崖壁旁，洞穴则用来埋葬死去的人。由于多贡人凶蛮好斗，基督教传教士和改宗的穆斯林都把他们描述成无法皈依的异教徒。人类学家却注意到，多贡人的民居，极为合乎逻辑地体现了其特有的宇宙哲学观。

在美国，主导性的居住模式是郊区化，这一点毋庸置疑。1980 年美国人口调查数据显示，超过 40% 的人口，也就是超过 1 亿的美国人，居住在郊区，这一比例高于居住在农村地区和中心城市的人口。无论从相对意义还是从绝对意义上来讲，大城市人口在减少。1950 年美国 25 个最大的都市中，有 18 个在其后的 30 年间人口逐渐减少。而在此期间，郊区化成为美国社会典型的表现形式；与小汽车、摩天大楼或美式职业足球相比，郊区文化也许更具代表性。郊区化是美国当代文化完整的、充分的具体表现形式；郊区化也是美国社会基本特征的展现，例如令人印象深刻的消费文化、对私家车的依赖、社会垂直流动、核心家庭、工作与休闲严格区分，以及在种族与经济上的排外倾向。

毫无疑问，“郊区”（suburb）一词是含义模糊的，它本身就足以释放很多谜团。少数人曾尝试对该词做出具体的解释，美国著名

专栏作家埃尔玛·邦贝克(Erma Bombeck)几年前谈到:郊区是小规模、有约束的社区类型;在那里,人们多半有着近似的生活水准,修剪同样的草坪,家家户户拥有同等数量的垃圾桶,同样的家居计划以及同样大小的化粪池。美国著名记者拉塞尔·贝克(Russell Baker)不无揶揄地说:“美国是一座大型购物中心,或者说是一家环绕乡村极速运转的购物中心。”

这不是陈词滥调,而是真真切切存在的,体现在整齐划一的自行车、旅行车以及露台诸方面。这一模式之所以能维系下来,是因为它符合政治谱系两端人们的期盼。对于那些持右派观点的人来说,这一模式确立了全民所渴望的“美国生活方式”;对于左派人士来讲,郊区的幻象正如一种使用灵活的武器,可以用来抨击各种全国性的问题,从文化的僵化到生态破坏。

学者们对这种模式是持否定态度的,但他们也还并未达成一致意见。诚然,某种过度反应表明匆忙下结论是不明智的。随着大都市区的蔓延,郊区化也逐渐演变成各地人们所普遍接受的生活方式。郊区化是一种规划模式,同时也是一种基于想象和象征的心智图景。经济学者以核心与周边地区的功能关系为基准,界定郊区化的地位;人口统计学者则按照居住密度或者通勤方式来界定它们;建筑师通过建筑类型来界定;而社会学家采用人们的行为或者生活方式来界定。美国人口统计署把大都市区看作一个由5万人口构成的中心城市,它也包括与之有一定程度通勤关系并具备一定城市化特征的周边地区的综合体。因为屈从于沉重的政治压力,人口统计署在界定“郊区”和“大都市区”时使用更多的是令人混淆的表述,不能带给那些严谨的研究人员以启发。词典中

的释义也绕过了郊区含混不清的人口学概念,而把郊区解释为:“那些坐落在镇或市外围并与其围墙或者边界相毗邻的居住区。”

由于种类繁多的地点经常被贴上郊区的标签,致使郊区的定义令人困惑。底特律的海兰帕克、洛杉矶的贝弗利希尔斯以及达拉斯的帕克城都是法律意义上独立但被大城市完全包围的地区。休斯敦的里弗奥克斯、堪萨斯城的坎特里特拉布以及布朗克斯的菲尔德斯通除了没有法定地位外,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都具备了郊区的特征。美国城市的边界并未遵循更合乎逻辑的常规划定。新泽西的纽瓦克充其量也就 23 平方英里,如此小的弹丸之地从市中心步行几个街区就到了另一个城市,或者可能进入另一个县*。佛罗里达的杰克逊维尔与纽瓦克人口数量差不多,但其蔓延的地域面积相当于纽瓦克的 40 倍,达 850 平方英里,其中包括沼泽和丛林。

即使我们把注意力仅仅局限在那些自治的社区,也很快能发现美国郊区在种类、格局以及面积方面所呈现的多样化——贫困的社区与富裕的社区、工业社区与住宅社区、新区与老区。从费城穿越特拉华河的新泽西卡姆登,以及通过这所“西进之门”跨越密西西比河的东圣路易斯,两座城市经济凋敝,致使它们所遗留的问题成为全国最棘手的问题之一;而旧金山外的希尔斯伯勒、芝加哥外的温内特卡以及纽约市外的萨德尔里弗,都以平均房价接近 50 万美元而为人知。有些外围社区以工业为主,但其他一些社区有严格的规划,受区划法限制,以保证所有住宅都能享受安静的环

* 在美国的行政区划中,存在县辖市的情况。——编者注

境。有些郊区,比如坎布里奇和新罗歇尔,比费城历史还悠久;相比较而言,像欧文、莱斯顿以及哥伦比亚这样的规划型社区则几乎全是新的。单一种族的郊区也很常见。仅仅是芝加哥的周边,就包括波兰裔的西塞罗市、犹太裔的司考基市、非洲裔的罗宾斯市、白人清教徒的森林湖市,以及以其民族多样性而自豪的橡树园和伊凡斯顿这样的地区。

尽管有这么多种明显的多样性,依然有人试图对美国的居住区发展进行一般性概括。许多读者可能对于在整个区域范围进行概括持异议,他们认为,像圣迭戈和达拉斯这样的“阳光地带”城市与布法罗和克利夫兰这样没落的制造业城市之间存在着根本差别,形成了不同的景观。美国大都市区之间的差异如此巨大,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辽阔的国土、大都市顺利发展时期的运输模式,以及当地的经济结构所造成的。但美国居住模式的相似性远大于差异性,尤其是在年代、离城远近及社会经济阶层确定的情况下。在地域差异清晰可见的情况下,流行的看法往往不见得正确。洛杉矶或凤凰城周边沙漠地带住宅区的典型特征是人烟稀少,闲置的空间随处可见,但这些住宅区的地价比起纽约或波士顿郊区相应地块的价格要低很多。

如果我们以国际化的视角来看待美国郊区化,其共性特征就明晰多了。一直以来,美国在四个重要方面具有独特性,可以用这样一句话来概括:富裕的中产阶级往往住在远离其工作地点的郊区,拥有私人住房,这些房子坐落在一个大院子的中心。若依据城市的标准,这些院落面积真是太大了。此外,这一独特性还涉及人口密度、自有住房、居民身份以及工作通勤。

美国大都市区的第一个显著特征是都市区居住密度低以及城乡差异的缩小。在所有的文化当中,土地的价格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距离城市中心的远近。因此,某一住宅占用空间的大小,从逻辑上来讲,外围总是高于中心。然而,从国际的宏观视野看,美国人口聚落是松散的,人口密度(密度弧线)的降低是渐进的,土地使用规划的力度不够,土地和房产比较容易获得,这对美国社会自我属性的认定起了关键作用。美国很多社区拥有宽敞的街道、大面积的草坪,人口高度分散,甚至在最大的组合城市里,每英亩土地上人口平均密度不到 10 人。早在 1930 年,纽约大都市区土地面积达 2 514 平方英里,人口为 1 090 万,每英亩平均不到 7 人;而纽约市的某些区是世界上最拥挤的地区。其他城市的人口更加分散,举例来说,1950—1970 年,华盛顿特区的城市化区域从 181 平方英里扩展到 523 平方英里。蔓延根源于美国人生活的私有化以及对独栋住房的喜好。1980 年,美国 8 640 万居住单元中,有大约三分之二,即 5 730 万户,居住在花草满目的庭院中央的独栋住宅中。

在其他国家,城市更加拥挤,与乡村形成巨大差异。哥本哈根、莫斯科、科隆以及维也纳的外部边缘由公寓构成分界线,乘火车 20 分钟即可到达乡间。同样地,开放空间环绕着锡耶纳和佛罗伦萨狭窄的街道和拥挤的住房。大都市东京自二战以来已经吞噬了数以万计的农场,但是其私人建筑地块很少超过 0.05 英亩。与西方城市不同的是,上海从法律意义上讲,包括数千英亩的高产农田,但其人口却集中在市中心,市中心的平均人口密度几乎达到每平方公里 10 万人。

瑞典人的生活水平可与美国人相媲美,因此,以瑞典为例特别